

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

黃美娥*

摘要

久保天隨是日治後期在臺最為重要的日本漢文人，1929 年來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1930 年創設「南雅詩社」，1934 年病逝於臺灣。畢生著述超過百種以上，因此被譽為日本國內有數的漢學家，但終身實以漢詩寫作為職志，計有二萬餘首。由於喜愛從事旅遊，因此足跡廣遍日本全國，以及中國、朝鮮、滿州、臺灣、琉球等，而詩人在進行實地遊歷的跨界行旅時，更以漢詩為溝通、交往之媒介，積極致力挽救漢文危機，故有助於東亞漢字圈之互動聯繫。不過，久保天隨不具「和臭」的詩藝，卻也同時隱藏著日本本位意識，乃至化身成為帝國主義「話語」的實踐，因而產生「同文關係」的尷尬性。而當其來到臺灣後，除了將本地視為熱帶圈景象書寫的材料，及以漢詩揚名立萬的嶄新天地外，更欲以詩壇主盟自居，但做為「新學」學閥的「舊詩人」身份，卻又不免與臺灣詩人有所扞格與摩擦，竟使得他在日本新學術潮流與臺灣傳統漢詩界中，同時陷入兩難的困境。至於所創設的「南雅詩社」，做為日人在臺的最後一個漢詩社，實具有承繼與總結日本在臺漢詩表現的脈絡意義，故其結束與開始都頗具重要性。綜上可知，久保天隨的漢詩跨界流動之旅，不僅與臺灣漢詩壇關係密切，同時無疑也是東亞漢詩文糾葛、交錯中的一道耐人尋味的光影。

關鍵詞：久保天隨、日治時代、臺灣漢詩、日本在臺漢文學、南雅詩社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貳、久保天隨的生平梗概與詩歌創作

參、「教授詩人」來臺灣

肆、久保天隨與昭和時期臺灣漢詩壇

伍、「南雅詩社」的文學/政治意義

陸、結語

壹、前言

久保天隨（クボ,テンズイ, 1875-1934）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漢詩人，從明治二十四年（1891）十七歲¹在《鷗夢新誌》開始發表漢詩後，迄大正時期已以「漢詩作家」身份而活躍於文壇²，昭和四年（1929）四月日本改造社出版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第37冊《現代日本漢詩集》中，將其列入大正時代重要漢詩人之內，而書中所附井土靈山的「概說」文字，更將其詩〈那須野〉與國分青厓（1857-1944）〈芳野懷古〉、田邊碧堂（1864-1931）〈萬里長城〉並列為「大正三絕」³，顯見其人其作深獲時人高度評價。不僅於此，由於昭和二年（1927）起，承接佐藤六石（1864-1927）死後遺缺擔任日本漢詩重鎮「隨鷗吟社」的主幹，其地位尤勝從前，故最終在日本國內被視為是與國分青厓、岩溪裳川（1852-1943）鼎足而三的詩人⁴。

不過，久保天隨不單是以詩名著世，其一生還汲汲營營於各式學術著作之撰寫、評釋與編輯，內容涵蓋漢學、文學、史學、藝術……，合計共有百種以上⁵，種類豐富而繁多，德富蘇峰（1863-1957）曾經譽之為「日本國中有數之漢學家」⁶，只是現今關於其人其作的研究仍鮮⁷。而在目前可見的少數研究文獻中，早期較引人注目的，乃是出於曾與久保氏有過接觸、互動者之手的文章，如大町桂月（1869-1925）寫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的〈赤門文士に就いて〉，文中簡要月旦

¹ 這是目前所知久保天隨最早發表漢詩的時間，參見《明治文學全集》41'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衣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東京：筑摩書房，1977）中所附「久保天隨年譜」，頁412。

² 參見村山吉廣〈久保天隨—大正詩壇の雄〉，文刊《漢學紀要》（9）（國士館大學漢學會編，2006），頁3。

³ 同上註，頁1-2。

⁴ 參見神田喜一郎所撰作者略歷「久保天隨」條，文見《明治文學全集》62《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頁434，以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第12272號夕刊（四）。

⁵ 關於久保天隨的著作，較清楚的類目可以參見周延燕〈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台北：台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07）第三章第一節〈久保天隨著作目錄〉，頁25-36；又，文中所列久保天隨著作情形如下：學術論著42種，創作類26種（包括詩、文、小說、隨筆等），註釋或釋評類33種，編輯11種，校訂18種，合集5種。此外，久保天隨長子久保舜一所撰〈久保天隨〉一文，對於久保天隨著述的已刊、未刊情形，也有一番說明，估算約140部左右，文見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衣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頁384，同註1。另，李慶《日本漢學史（貳）：成熟和迷途》（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則言有170餘種，頁436。

⁶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夕刊）第12272號（四）。

⁷ 即使是日本學界本身，亦少相關研究，李慶在前揭書中，便頗有感觸地提及：「但不知為什麼，日本學界對他的研究似乎不多。」而筆者在查索相關研究資料時也有此體會。

了久保天隨詩文書寫的風格與特色⁸；又如久保舜一（1908-）、黃得時（1909-1999）則是在久保天隨逝世之後，撰寫了年譜與小傳⁹，以上所述由於具有親見親聞的性質，故往往成為後人認識久保天隨的重要依據。

至於晚近出現的研究文獻，其特點則是能就久保天隨著述成果進行較深入的剖析。例如，在漢學研究著述方面，三浦叶指出了先生早年儒學著作《日本儒學史》、《近世儒學史》二書，實係明治年間日本漢學史的重要著述，其後町田三郎更加深化此一觀點，清楚點明二書乃位居日本漢學史嚆矢的角色，且藉之有助理解古代到幕末，乃至近代明治時期儒學發展的歷程¹⁰。而在文學研究方面，芳村弘道以為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具有做為日本早期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奠基意義，且對其人文學史幾次刊行內容的變化與特殊史觀感到興趣¹¹；李慶則是對《支那文學史》能重視素來被輕視的小說、戲曲，以及從地域文化之區別去探討先秦文學，引為洞見之論¹²；另，張杰關注久保天隨的戲曲研究，以為《中國戲曲研究》超越森槐南（1863-1911）、狩野直喜（1868-1949），開啟了青木正兒（1887-1964）明清戲曲研究的先聲¹³。唯，雖然晚近日本或中國學界，對於久保氏之漢學與文學研究成績已能多所留意，甚至不乏讚賞者，但若相較於近十餘年來，內藤湖南、吉川幸次郎、津田左右吉、青木正兒……等日本中國學家、漢學家，早已成為日本與中國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甚至在中國已有專著專論之情況¹⁴，則久保天隨漢學或文學的學術著述表現，實際所獲關注仍然有限。

其次，要再加說明的是，除上列側重於久保天隨學術研究著述的討論之外，另有若干論述係針對久保天隨的文藝創作成果而發，譬如與久保天隨有臺北帝國大學同事之誼的神田喜一郎（1898-1984），便曾對於久保氏的詞作風格，及其當年能與中國著名詞家往來的難得情景別有論斷¹⁵。不過，若以日本國內研究情況來看，更多相關研究文獻係聚焦於久保天隨的漢詩成就上，而這樣的現象隱約直指了久保天隨在後人眼中的身份定位，毋寧仍以「漢詩人」最受認可。且真實的情形是，連久保天隨之長子久保舜一在其所撰〈久保天隨〉一文中，也提及其父最擅長者即為「漢詩」寫作¹⁶。

那麼，日本有關久保天隨漢詩的研究情況如何？以上里賢一〈久保天隨『琉球

⁸ 參見大町桂月〈赤門文士に就いて〉，文章收入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衣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頁378-381。

⁹ 久保舜一曾撰〈久保天隨〉一文，並協助撰寫年譜，二者皆已收入《明治文學全集》41，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衣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中；而黃得時則寫有〈久保天隨小傳〉，文刊《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卷二（廣島大學文學部中世文學研究會編，1962），頁48-53。

¹⁰ 參見三浦叶〈明治年間における日本漢學史の研究〉，文刊《斯文》53、54 合併號（1986），頁14-19；町田三郎〈久保天隨の學術成就—以漢學史研究為探討重點〉，文章收入《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頁51-68。

¹¹ 參見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文見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頁63-79。

¹² 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貳）：成熟和迷途》，同注5，頁436。

¹³ 參見張杰〈久保得二及其《中國戲曲研究》〉，文刊《戲曲研究》第六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頁245-251。

¹⁴ 例如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張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劉萍《津田左右吉研究》，以上三書皆於2004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¹⁵ 參見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700-710。耐人尋味的是，神田喜一郎對於久保天隨當時能與中國幾位重要詞家沈蕙風、徐仲可書信往返，卻未能同步理解或傳播當時中國詞界、詩界重要美學觀點、理論到日本，表示遺憾與不解，於此多少顯現出久保天隨的才能更在「創作」而非「學術研究」的敏感度上。

¹⁶ 參見久保舜一撰〈久保天隨〉，同注8，頁384。

游草』について〉¹⁷與村山吉廣〈久保天隨—大正詩壇の雄〉¹⁸、〈久保天隨の生涯と詩業〉¹⁹……等文來看，內容大抵偏於久保天隨生平事蹟與漢詩創作生涯的簡述，以及詩歌作品綜論，或個別詩集內涵的探索。而較值得一提的，森岡緣於 2008 年甫出版，以鈴木虎雄（1878-1963）與久保天隨為主要論述軸心，進以觀察日本與東亞相交錯所產生的諸多漢詩問題的《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²⁰新著中，收錄了〈近代日本漢詩人の草山詠—鈴木虎雄、久保天隨を中心に〉、〈文化表象としての『游草』—久保天隨のアジア旅行とその詩〉、〈久保天隨と魏清徳—近代日・台文人交流點描〉、〈久保天隨の李商隱觀—その言説と創作をめぐって〉多篇與久保天隨有關之論文；這些論述，對於久保天隨來臺蹤跡、在臺友朋唱酬剪影，及其人多本以「游草」命名的詩集的文化/文學深層結構意涵，乃至作者的詩觀，都有詳實的闡釋與考掘，堪稱歷來日本有關「久保天隨」研究之重要突破。

而誠如森岡緣之能留意到久保天隨與臺灣的密切關係，倘若暫時擱置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常見的相抗性的史觀詮釋框架，另由更開闊的「作家個案研究史」的角度加以考量，則近幾年來臺灣所出現的數篇期刊、學位論文亦不宜忽略。由於久保天隨曾於 1929 年來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其後又創設「南雅詩社」、出刊《南雅集》，最終於 1934 年病逝於本島，且其人藏書亦為臺大收購成為珍貴館藏「久保文庫」的特殊因緣，促使臺灣學界紛由教育生產、圖書文獻學、詩歌美學，或旅行書寫（尤以澎湖為主）視域去進行相關探討²¹。因此，從「臺灣學」研究出發的國內「久保天隨研究」，雖然具有強烈本地色彩，但卻有利於增益、強化過去以來在日本內地本身並不豐碩的久保天隨研究的內容廣度與思考向度。

那麼，以「臺灣」做為一個方法論，能為久保天隨個案研究帶來怎樣的啟發與開拓？在上述可見的幾種分析面向外，面對一位行旅曾經跨及日本（包括琉球）、中國、朝鮮、滿洲、臺灣的漢詩人而言，其實已經憑藉出色的漢詩能力穿越東亞不同國家與地區，故從其人其作之中可以據以觀察「漢詩」在東亞的資源性與歷史性，甚至思索在交錯的異文化之間，「日本漢詩」存在的角色位置與工具意義，這對於今日東亞學界所致力探討的「漢字圈」論域，無乃具有高度的問題性與思辨性，則顯然久保天隨的漢詩「跨界」經驗頗堪玩味。但，限於篇幅與精力，本文尚無法針對久保天隨與整個東亞漢詩壇之間的種種密切關係進行考究，而於此僅能先就其人與臺灣漢詩壇的關係性加以著墨，除了設法掌握久保天隨在臺創設「南雅詩社」、主編《南雅集》的文學活動意義外，尤其要在日、臺兩地因漢字而形構的「同文」關係框架中，去思考肩負「學院派」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榮光，且做為日治後期在臺最為重要的日本漢詩人身份²²，久保天隨究竟會為當時的臺灣漢詩壇帶來

¹⁷ 文章收入《第二屆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那霸：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會，1989），頁 17-56。

¹⁸ 出處同注 2，頁 1-18。

¹⁹ 文刊《中國古典研究》第 51 號（中國古典學會編，2006.12），頁 82-94。

²⁰ 參見森岡緣《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東京，勉誠出版，2008）。

²¹ 相關研究如張寶三〈久保得二先生傳〉，文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史稿（1929-2002）》（台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頁 185-188，以及另文〈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珍本日本漢籍之來源、特色與學術價值〉，文刊《臺大中學報》第 25 期（2006.12）頁 375-416；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論文，2003）；周延燕〈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台北：國立台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文刊《成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7.10）頁 117-142。

²² 雖然在 1934 年久保天隨死後，另一位同樣具有漢詩人身份的神田喜一郎繼任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但由於神田喜一郎與臺灣漢詩壇互動較少，故其重要性遠遠不及久保天隨，因此做為日本來臺未代漢詩人之表徵，無寧仍是久保天隨。

何等刺激與影響？而其跨界來臺的文學/文化交流樣態，較諸明治、大正年間稍早其他日人曾經舉行的各式吟會與徵詩活動，具有何等歷史脈絡意義？其人在臺具體心境如何？與臺灣文人有何互動？以上種種環繞日、臺間漢詩問題而生的文學史迷霧，會在久保天隨生涯尾聲的臺灣歲月裡，留下何許痕跡與印記？相關答案需要娓娓道來。

貳、久保天隨的生平梗概與詩歌創作

日治時代的臺灣，曾經有過為數不少的日本漢文人來到此地，故孕育出一段極為可觀的跨界傳播/移植的日本在臺漢文學史，以及充滿交混/角力關係的日、臺漢文交流史²³，而久保天隨堪稱這段歷史的最末期代表人物，因此別具意義。而在探索其人與臺灣漢詩壇的種種接觸、互動面貌之前，以下將先就其人形象與詩歌特色略作闡述，如此有利於認知久保天隨的詩歌創作能力，以及「漢詩」如何成為其人畢生雄厚的文學/文化資本？

(一)

久保天隨，名得二，號天隨，又號默龍、青琴、兜城山人、秋碧吟廬主人……等，生於東京，有關其人生平，由於已有年譜、傳記之書寫，因此於此不擬多加陳述，而僅摘錄其人逝世之後，《臺灣日日新報》上之相關報導。而此篇文獻除有久保氏之個人小傳外，尚述及其人學經歷背景、來臺淵源、病逝經過以及子女教育情形。由於這段新聞，部分敘述或為久保舜一〈久保天隨〉一文所缺，或屬已刊年譜所未載者，故不厭繁瑣羅列於下，唯若遇有與原有年譜、傳記所述相異或不足處，則另註說明，詳見如下：

臺北帝大文政部教授久保得二氏，自一二月前，患第二次盲腸炎，入臺北醫院，醫治奏效，退院未幾，於一禮拜前，起腦出血²⁴，月一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於昭和町官舍，報稱絕望，享年六十。氏號天隨²⁵，明治三十二年七月畢業東大文科漢學科，歲十月入大學院，過此凡二十年間從事著述，又嘗三年²⁶間為法政大學講師，大正四年任遞信省囑託，五年任陸軍經理學校囑託，八年末入宮內省圖書寮編纂歷代天皇實錄，九年任圖書寮編纂官敘高等官六等。昭和二年，以所研究之西廂記論文通過，榮獲文學博士。四年四月

²³ 相關情形可以參見拙文〈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行異〉，文刊《臺灣文學研究叢刊》第二期（2006.11），頁1-32。

²⁴ 對於因何會腦溢血，黃得時提到因為住家附近突有落雷，聲響很大驚嚇所致，參見前揭文〈久保天隨博士小傳〉，同注9，頁50。不過黃文寫及久保天隨病逝日子為1934年6月2日有誤，據久保舜一前揭文〈久保天隨〉一文，同注8，頁383，以及此處《臺灣日日新報》所載皆是6月1日。

²⁵ 關於取號「天隨」，久保舜一〈久保天隨〉，同注8，頁381，以為其父在十四、五歲時，因為讀《莊子·在宥篇》「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而來，但王樹梅在為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 丙籤》（東京：久保得二自印本，1926）寫序時，則言其「平生慕甫里陸天隨（筆者案：指唐人陸龜蒙）之為人，故自號天隨云」，如此顯有二說。至於久保得二，除「天隨」之外，另有默龍、青琴、兜城山人、虛白軒、秋碧吟廬主人等號。

²⁶ 久保舜一記為任職四年，參見前揭文〈久保天隨〉一文，同注8，頁382。

十一日，任臺北帝大教授敘高等官三等，十九日到任，其後繼續擔任東洋文學講座。氏賦性坦率，不修邊幅，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窺，著作汗牛充棟，其所專攻為支那戲曲傳奇，然不多作。詩七古，逼肖梅村，猶長於五律，十餘年來，續執隨鷗吟社及斯文會牛耳，挖揚風雅，日本國中談漢詩者，至舉國分青厓、岩溪裳川二先生，與氏鼎足而三。計渡華三次，與閩中耆宿陳石遺先生友善，如閩中游草、澎湖游草諸詩卷皆其序文。氏生平所作各體之詩，不下二萬餘首，老文豪德富蘇峰先生，嘗稱氏為日本國中有數之漢學家，可以想見其盛名之一端矣。氏之服官臺灣，發端於上山總督之時，而實現則為川村總督時代。蓋氏之先考讓次翁，於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二年²⁷任臺東廳屬，讓次翁捐館之年，氏適畢業東大；故氏於上山總督時之來遊臺灣，為欲憑弔其先人服官東臺灣舊跡。上山總督嘗宴氏於東門官邸，招小松天籟、豬口鳳菴、尾崎古村諸能詩者，相與分韻攤箋，席上山總督力勸氏來就職為臺大教授；爾後又嘗為川村總督講解詩學。一面提倡南雅吟社，月會一次，南雅詩集經剝刷至第三集。氏此回之絕望，不獨為臺灣之損失，抑亦日本全國漢學界之損失也。惟幸詩人有後，四子舜一君，畢業東大文科心理學科；次子昌二君，畢業東大理科，現在職理化學研究所；三男啟三君，臺高尋常科在學中，每回試驗必以首席，魁其儕輩；四男亮五君，入臺北一中；長女雪枝，本年以首席畢業臺北第一高女，無試驗推薦入東京女子高師；次女春野，臺北第一高女在學中。內地人家庭，雖大抵為教育的家庭，然欲求如氏之四男二女，個個優秀，真寥寥罕覯，難能而可貴也，謂非氏之頭腦明晰，及夫人賢淑遺傳，曷克臻此。氏老母尚在東京，一聞氏之絕望，當不知其如何老淚縱橫云。²⁸

透過此篇題為「臺大教授文學博士 漢詩人久保氏絕望 在昭和町大學官舍」的報導內容，可以充分理解久保天隨的一生事蹟與重要成就，故此文幾可做一篇墓誌銘觀。全文鉅細靡遺歷陳了久保天隨畢生的官職履歷，漢學、文學研究表現，以及孕育傑出後嗣的良好家庭教育者形象，然而全文焦點所在，莫過於久保天隨「詩人」形象的浮現與刻畫；但其實在平素的擲筆染翰中，久保天隨也有遊記、雜文、小說、美文傳世²⁹，只是誠如本文所示，真正蓋棺論定者仍在「漢詩」之表現上。又，此文還言及了久保天隨一生的詩歌創作數量，總計高達二萬餘首，可見「漢詩」在詩人日常生活中的確具有特殊意義；另外，文中也回溯了其人來臺時，曾與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1869-1938）、在臺日人詩會吟宴，乃至後為第十二任總督川村竹治（1871-1955）講述詩學，尤其呈顯了久保天隨一枝獨秀的「臺大教授」、「東大文學博士」、「日本國內有數漢學家」的詩人之姿，愈加確立了久保氏在臺灣漢詩壇翹然高踞的尊崇地位與角色意義。

（二）

²⁷ 筆者案，《臺灣日日新報》誤作「二十二年」，逕改之。

²⁸ 文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夕刊）第12272號（四）。又，為便於今人之閱讀，此處所錄相關報導之內容，已採用新式標點斷句；後若亦有引用日治時期報刊者，情形亦同，不另說明。

²⁹ 相關作品類目，可以參見周延燕《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台北：國立台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29。

而為了能更清楚認知「漢詩人」久保天隨，此處要再就其人相關詩歌創作情形加以敘述。

在上一段新聞報導中，已經論及久保天隨詩歌著述繁多，而實際除了若干「游草」與詩集之外，久保天隨尚積極於從事詩歌釋解、編選與詩話之作，例如詩歌翻譯註釋方面，其所譯解的《李太白詩集》是「日本首次的全譯」，迥異於過去江戶、明治初期的訓點方式，開啟了用現代日語翻譯註釋的新風氣，在當時社會頗具影響力³⁰；其次編選作品與詩話方面，從其《茶前酒後》詩話中，也可以一窺其人誦詩論世之旨，以及大正、昭和之間詩風源流升降遞變之故³¹。以上，此類著作本身固有其貢獻，但也同時顯現出久保天隨終身對於「漢詩」的熱愛與關注，且熱心投注於保存、延續與推廣之工作。

當然，久保天隨個人最具代表性的詩歌著作，莫過於《秋碧吟廬詩鈔》的印行，計有甲籤（1917年聲教社發行，收錄1913年至1915年作品）、乙籤（1921年隨鷗吟社發行，收錄1916年至1918年作品）、丙籤（1926年發行，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19年至1921年作品）、丁籤（1927年發行，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22年至1924年作品）、戊籤（1938年發行，久保舜一自印本，收錄1925年至1930年作品）；以及多本以「游草」為名的詩作，包括已刊的《讚州游草》（1920年刊，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20年8月作品）、《關西游草》（1922年刊，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21年7、8月間，凡三十日作品）、《檜域游草》（1924年朝鮮總督府發行，收錄1922年8月以後，共三十日之作品）、《續關西游草》（1924年刊，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23年8月1日至24日之作品）、《遼瀋游草》（1925年滿鐵鐵道部旅客課發行，收錄1924年8月以後，共三十日之作品）、《閩中游草》（1931年刊，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30年12月作品）、《澎湖游草》（1933年刊，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32年3月作品）、《琉球游草》（1933年刊，久保得二自印本，收錄1932年6月作品），以及未刊的《禹域游草》（收錄1925年作品）、《樺太游草》（收錄1926年作品）³²。上述詩集除部分可見諸於臺灣大學、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館藏外，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由於獲致久保天隨之子「久保亮五」的贈書，故所存最為完整。

透過上述詩作，吾人可以發現久保天隨之生命型態實與漢詩書寫相始終，舉凡詩集內容之刻意按年編排繫詩，或各詩集之設法陸續次第發行，都能理解久保天隨是有志於此，且寄情於此。其曾在《秋碧吟廬詩鈔》甲籤序中，述說了自我書寫漢詩的歷程與心境，他自況：弱冠前後的詩，「陳腐滿楮，轄句束字」不甚滿意，而且也已散佚；至於後來二十二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與卒業之後的賣文為活生涯，則是無暇吟哦，要到後來有機會誦讀唐宋元明清與漢魏詩集後，才稍有悟境；迄至大正二年（1913）才將數百首的詩作匯集成為生平的「第一卷」詩作，而出版詩集的意念至此始萌生，之後《秋碧吟廬詩鈔》甲籤才成為久保天隨的第一部詩集³³。在出版首部詩集時，詩人更一片血性地發出激昂之語：

³⁰ 參見李慶《日本漢學史（貳）：成熟和迷途》，同注5，頁438-439。

³¹ 參見古城貞吉〈秋碧吟廬詩話序〉，文章收入《茶前酒後》卷一（東京：久保得二自印本，1929）。

³² 關於未刊的《禹域游草》、《樺太游草》兩詩集，目前筆者尚未尋見，此據《秋碧吟廬詩鈔》丁籤書末所附「刊行詩集目錄」而知。不過，久保天隨一生未刊的詩稿並不止於這兩種，在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仍有若干未刊詩作，詳細書目可以參看周延燕《近代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及其藏書研究》（台北：國立台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62-65。

³³ 然而，《秋碧吟廬詩鈔》甲籤雖然成為久保天隨的第一本詩集，但此冊所集詩作正如文中所述，是從大正2年起；換句話說，在本年度之前的許多漢詩未能納入詩集之內，故日後若想完整掌握詩人的創作史，

取稿付梓先成此冊，自今而後，每三四年續刊，庶幾終生無絕。願萬卷書既讀矣，萬里之道既行矣，而萬首之詩未成，其不如古人者，終是吾性之所不及也歟！³⁴

而事實是，在六十年的生命中，久保天隨終究完成了如斯充滿豪情的夢想。從《秋碧吟廬詩鈔》甲籤之後，恰如上面臚列的各式詩集，每年的八月彷彿是久保天隨的「旅行月」，他的行止遍及日本島內與琉球、中國東北與閩南、朝鮮與臺灣，還有澎湖，甚至獲得臺灣總督的當面稱揚，以及朝鮮總督府的出資印行詩集，其筆下的漢詩在東亞之間越境跨界，當他曾經想要「聊以東亞文獻研究第一人自期」³⁵時，漢詩何嘗不是為其營造了另一種「東亞詩雄」的想像疆界，漢詩的書寫為久保天隨開啟了每一個嶄新的天地，終其一生中，久保天隨寫下了二萬餘首詩³⁶。

而對於漢詩寫作的竭心盡力與如癡如醉，其友人岡崎壯在為《秋碧吟廬詩鈔》戊籤作序時，述及了一段往事：當久保天隨晚年在臺灣病危之際，他囑託印人平井榴所刻印章恰恰完成，其上刻有「志在不朽」四字，當時詩人「病已革而喜甚，褥中支手，把以自摩頰者數四，抱之而泣。」此情此景，讓耳聞此事的岡崎壯，忍不住為之慨嘆「嗚呼！亦可以知其本領矣！」³⁷顯然，對於終身浸淫漢詩寫作的久保天隨而言，這是通往「不朽」的道路，而更令人感動的是其對「志」的體認、貫徹與堅持；堪足告慰的是，時人咸「知其本領矣」，這便是「漢詩人」久保天隨的最佳寫照。

(三)

那麼，志在不朽的久保天隨，其人詩歌內涵底蘊究竟存有何等大志與意趣？其詩技藝如何撼動人心，展現詩壇巨將的風範？在分析久保天隨詩作內容、創作旨趣的同時，其實也可裨益吾人更加貼近久保天隨的漢詩世界與內在心象。

1.

做為一名文人與學者，久保舜一認為其父「終生對政治冷感，不關心政治，只埋頭在自己的世界中。」³⁸然而，在久保天隨的漢詩國度裡，卻不是封閉、固鎖，

則其先前曾經發表於《鷗夢新誌》、《帝國文學》等的漢詩，此部分之輯佚工作亦應正視。其次，做為久保氏詩集最後一本的《秋碧吟廬詩鈔》戊籤，其中頗多是寫於臺灣的作品，但久保天隨客台期間，曾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詩報》上多所發表，甚至連日本《斯文》亦有〈南航小草〉之作，如果將之與原先已經出版的詩集仔細比對，則除了發現日、臺報刊與詩集文字有所差異之外，有些則更屬佚稿，可以提供校勘、補缺之用。再者，從臺灣報刊之中，還可發現《秋碧吟廬詩鈔》戊籤最後詩歌繫年標誌為1930年，但若核對報刊資料，將會發現如〈送長女雪枝歸京〉、〈送尾崎古邨歸濃州〉實際皆作於1934年，詩集繫年有誤。另外，當1933年，久保天隨從琉球回來之後，又去了壹岐、對馬，此部分詩作在現存可見的詩集與游草中皆無存錄，但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卻可獲見。綜上可知，《秋碧吟廬詩鈔》與多本《游草》雖是久保天隨畢生主要的詩歌代表作品，但此並非其人詩歌總合，相對地仍只是部分「別集」而已，故更完整的彙編、輯佚尚待進行。

³⁴ 參見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甲籤〈自序〉，頁1。又，原先久保天隨《秋碧吟廬詩鈔》甲籤〈自序〉文字並無標點斷句，此處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後續引用情形亦同，不另說明。

³⁵ 轉引自李慶《日本漢學史（貳）：成熟和迷途》，頁436。

³⁶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第12272號夕刊（四）。

³⁷ 以上事實，參見岡崎壯所撰《秋碧吟廬詩鈔》戊籤之〈跋〉。

³⁸ 參見久保舜一〈久保天隨〉，頁384。

不問世事的，他的詩中雖不主動涉及、介入時代政治，但其憂心焦慮日本國內「漢文不振」，企盼重整斯文的熱切渴望，卻始終不加遮掩。如同其有感於日本國內「自泰西文物東漸以來，風氣一轉，趨捷徑者，持之若驚，而漢詩漢文一道，遂等告朔餼羊，尚之者寥寥如晨星」，所以就與宮崎來城、上村賣劍、結城蕃堂等人，倡設「同好會」，專以研鑽漢詩、漢文為主旨，以鼓吹文運，並且還發刊《新詩文》雜誌，誘掖後進，刊載佳詩、佳文³⁹。此等挽救斯文於將喪的心志，在其漢詩世界中也歷歷在目，且更顯真摯之情。

詩人寫於大正六年（1917）的〈歲晚書懷〉透露如許心聲：「鏡裡慣看飢鳳姿，撐腸書卷與貧宜。一寒且怕冰霜緊，垂老偏驚歲月遲。輦轂詩人無氣慨，江湖酒伴孰心知。窮餘始信才堪用，大雅扶輪措我誰。」（《秋碧吟廬詩鈔》乙籤，卷五，頁33）作品中的詩人既窮愁潦倒，又憂年華老去，「飢」、「貧」、「老」、「驚」、「窮」數個強烈字眼，表明其人處境與身體感知狀態，然而「措我誰」的堅定態度，才更是對自我「大才」的高度肯定，也是久保天隨對於「扶輪大雅」此一重荷始終不放棄的責任與使命。相同的吶喊，也曾見諸於〈高橋月山招飲〉一詩裡，其慨言：「世途每嗟險，文士漫相猜。大雅遺音絕，江湖誰主盟。」（《秋碧吟廬詩鈔》丙籤，卷八，頁8），在絕望感傷之中，又有著一股力挽狂瀾、捨我其誰的承擔氣概。

所以，王樹梅在為《秋碧吟廬詩鈔》丙籤作序時便指出：「久保先生……躬值邪說橫行、斯文絕續之交，思以一身維聖學、正人心，凡柴乎其胸，而接構於耳目者，罔不發為詩歌，形諸詠歎，以寄其箴時諷世之思，蓋非苟為己也。」正是這種想要扶振漢文的大志，促使其能與原本陌生的東亞各地漢文人同聲共氣，得以在詩會友的文學氛圍之外，更加連結了彼此之間的漢文危墜感，激起協同振興的慾望，例如寫於漢城的〈酒間鄭葵園見贈短古一章次韻答之〉：「如今殊域遇賞音，縞紵修盟且常揖。大雅扶輪定屬誰，悵絕詩國皆荆棘。與君道同好相謀，筆路藍縷須努力。」（《遼瀋游草》，頁3）雖然是在朝鮮與當地詩人相遇、唱酬，但因為對漢詩的喜愛，以及對漢詩命運格外關心的緣故，卒使兩人志同道合，而有了齊力扶持風雅的宏願。

但有些時候，久保天隨即使未透過直接呼告的方式來鼓吹風雅，僅僅單憑其「才氣充溢、詞采瑰麗」的漢詩造詣⁴⁰，在其作品的跨界傳播、交流之中，也能逸散出某種光與熱，促發更多人關注漢詩、書寫漢詩，此不僅如楊成能所謂的可使「摧毀漢詩」、「輕視漢詩」者感到慚惡、知所奮勵⁴¹，亦正如林無玷在《閩中游草》序言所述：

因嘆吾國文獻衰墜，喜新之士方以與體詩相標榜，其意非推國粹於萬劫不復之地弗為快。先生日本人，日本文字雖與我國同，中間兼用和文，其發音與結構之法實不相類，宜其作韻語，或艱澀枯強，不易叶於音調。願讀先生詩，不但不艱澀枯強，而於浩瀚淵博中，更以聲調神韻擅長，尤難能矣！……吾國喜新之士，數典忘祖，輕棄其國學，而據語體詩自豪者，視先生得無少媿也乎！⁴²

³⁹ 參見植亭〈拾碎錦囊〉（百九十九），文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4月7日。

⁴⁰ 語見林無玷〈閩中游草序〉，文見《閩中游草》頁2。

⁴¹ 參見楊成能《秋碧吟廬詩鈔》丙籤序言，頁1-2。

⁴² 參見林無玷〈閩中游草序〉，同上注。

雖然，林氏之所言是基於一種不能屈服於日本漢詩的心理而出，但久保天隨其人其詩終究有其值得敬服之處，進而成為日本之外的異域（此指中國），得以藉之激勵漢文、復興漢詩書寫的動力來源之一。

如此一來，久保天隨實地遊歷的跨界之行，或其詩歌、詩集的傳播流動之旅，或多或少促使東亞漢文人/漢詩學/漢文化有了較多的碰撞與接觸，尤其是有利於凝聚各地因漢詩文危機而高度關切的同感共鳴，而詩人原本可能更多原係為了旅遊踏查的東亞詩歌行旅，卻因茲拉近了東亞各國、各地的距離，憑添幾許「漢文想像共同體」共同面臨危機的同舟共濟之感，甚而使得不同地域間的漢詩文化、漢詩人相濡以沫，這不僅讓東亞各地的漢字圈有更多聯繫互動的契機、發展，其實也有益於淡化當時日本及其他以外地區，因為統治問題而存有的國族政治的緊張感。甚至，在其與各地的接觸體驗中，久保天隨也以漢詩創作活力，與致力提振漢詩文的形象，獲得各地文人的喝采、景仰；於是，在其以漢詩所串起的東亞越境之旅中，久保天隨毋寧是以一種雄偉的英姿遊走各地。至此，屬於他的「漢詩王國」，將不單只是具有數量突破萬首的量化意義，而更有著成功橫跨東亞疆域的質性價值。

2.

然而，久保天隨的詩歌，不是時時刻刻充滿著昂揚迎向挑戰的氣魄，在某些詩的角落裡，原本不重抒情傳統的日本漢詩書寫，偶爾也會有著悠悠然洩出懷才不遇的陰翳時刻，這是口吃、卻又能下筆力就千言的詩人⁴³，生命裡的真正悲哀，而這種情況最常出現是在歲末之際，不過也就在這詩人鬆懈心房的時候，才能體會到其人真正的「言志詠懷」之作。

大正八年（1919），詩人這一年已屆四十五歲，其〈餞歲〉如是說：「挑燈坐到五更前，世事無端意黯然。只願邦威及殊域，何由穀價抵凶年。終生貧苦仍非病，驚俗文章獨自憐。且待鼓聲催曙色，陌頭車馬去朝天。」（《秋碧吟廬詩鈔》丙籤，卷七，頁 33）詩中留下了「貧苦」而「自憐」的詩人圖像；而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日本藉著巴黎和會擴張其在世界的影響力，但國內卻有「米騷動」及戰後經濟不景氣的問題，則詩中所謂「只願邦威及殊域，何由穀價抵凶年」，不無批判現實之意義。洎自大正九年（1920），久保天隨的境遇似乎尚未好轉，從其〈莊益堂豐宅守歲疊韻〉二首之一：「悔被聰明誤，到今吾道艱。行藏嗟白首，心跡繫青山。賣字頻為客，尋詩且愛閒。匆匆歲華盡，鏡裡鬢毛斑。」（《秋碧吟廬詩鈔》丙籤，卷八，頁 31）來看，顯然隔了一年，久保天隨除了鬢毛更見斑白外，還更有著年復一年生活愈趨艱難，甚而想要隱逸青山的念頭。

當然，大多數的時刻，久保天隨會隱藏或擱置內心的窘迫，用更為快樂的心情進行漢詩書寫，而這些結晶往往就是大量的旅行攬勝之作。他因為從學生時代就常徒步旅行，加上還是日本山岳會初期的會員，所以足跡廣遍日本全國⁴⁴，遊歷、踏查自然成了最大的嗜好，其後更進一步有了中國、朝鮮、滿洲、臺灣、琉球等地之旅。於是相對地，登山、旅行的歡樂，就成為其《秋碧吟廬詩鈔》甲籤到戊籤，以及多種《游草》中的主要創作材料，只要翻閱相關詩集，就能見到每到一地、一國，隨著各個地名的披露，動態的旅行路線遂被展示出來，而當地景觀、古蹟、名勝，

⁴³ 參見黃得時〈久保天隨小傳〉，同注 9，頁 50。

⁴⁴ 參見久保舜一〈久保天隨〉一文，文見久松潛一編《鹽井雨江 武島羽衣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頁 382。

乃逐一化為久保天隨的筆下風光⁴⁵；這些寫景作品，常以「詠史」、「覽古（或稱懷古）」的詩歌型態出現⁴⁶，此多少來自於久保天隨喜讀史書、兼擅考據之癖，因此在觀景登覽之際，屢屢有興衰之嘆，導致各地、各國的歷史，在詩中道德化、象徵化、空間化、永恆化，形塑出別具魅力的詩歌美感，且往往隱含了作者的倫理認知、歷史意識與道德判準，值得細細考察。鈴木虎雄清晰地洞穿久保天隨此等漢詩書寫的特色，其在《琉球游草》撰序之時，便深刻表述此一現象，他以為：

君素通於史事，故經異土，履殊境，覽山河草木之勝，撫古今人物之跡，其胸中磊落骯髒之氣，方相觸發，而為絕妙好辭。夫世稱君為文辭大家固也，然而未知其有史學之助。……至其考據之謹，文辭之奇，則讀者殆將自得焉。⁴⁷

足見藉由「史學」之助，久保天隨得以讓其筆下風土人情、名勝古蹟的描述更為具體有力，且又富含歷史興味。而在詠史、覽古的創作類型之外之外，詩人也愛賞梅、玩硯⁴⁸，故也有不少此類作品，即使單以詩作名稱也能略窺一、二，於茲可知其人審美況味；至於讀書⁴⁹、飲酒⁵⁰與參加詩會，更在其詩集中記錄頗多，這已彷彿是久保天隨日常生活，或甚至是生活作息的一部份的顯影了。

3.

而關於久保天隨的詩歌技藝，其絲毫無「和臭」⁵¹，幾乎是每位為久保天隨詩集作序的中國文人的品鑑共識。由於飽讀中國歷代詩集，了解各派詩風特色以及相關詩學變化脈絡，因此造就了保天隨之詩作「於我國（案：指中國）各家詩，彌不精研，故所作之博瞻，無一字無來歷也」，且不會因為日本文字與中國雖「同文」而發音、結構實不同，以致影響音調之諧和，反而能擅長聲調與神韻⁵²，且因為學問涵養豐厚，故其詩「奄有眾家之長⁵³」、「非專學一派者⁵⁴」。因此，久保天隨之漢詩，從形式上而言，無寧已等同於中國之漢詩，可謂塑造出日本的「中國化的漢詩」

⁴⁵ 關於久保天隨之從事各地旅遊及其相關詩作，森岡綠〈文化表象としての『游草』—久保天隨のアジア旅行とその詩〉一文有精彩剖析，文中將久保天隨其人其事其作置放日本近代文化脈絡下加以考察，剖析其人行旅與近代觀光意識、商業主義、日本官方調查事業、帝國主義密切攸關，以及各游草中相關作品的創作題材與內涵意義，所見值得參考，文章收入氏著《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同注 20，頁 169-198。

⁴⁶ 相關作品幾乎遍佈於《秋碧吟廬詩鈔》甲籤至戊籤，以及各種游草中，如寫於讚州的〈清少納言墳〉、〈展日柳燕石墓〉、〈鼓岡懷古〉，游於關西的〈過青村竇道有感於僧禪海之事乃賦此〉、〈山路素行謫居址〉，成於朝鮮的〈景福宮詞〉、〈箕子陵〉、〈扶餘懷古〉，撰於滿洲的〈志士碑即沖橫川二君殉節處〉、〈遼陽詠古〉，以及後來到中國閩中，或臺灣、澎湖以及琉球等地亦復如此，顯示在創作生涯的各個階段中，此類詩作趨向一直是久保天隨漢詩極為明顯的特色。

⁴⁷ 參見鈴木虎雄為《琉球游草》所撰序文，文見《琉球游草》頁 1。

⁴⁸ 久保天隨的賞梅與玩硯詩，在詩集中經常見。

⁴⁹ 久保天隨閱讀豐富，單從古城貞吉在詩集〈秋碧吟廬詩鈔序〉中所述：「吾友久保天隨善詩，才儲八斗，學富五車，史子說部，以至詞曲傳奇，皆莫不通曉。故其詩，吐屬虹霓，五彩紛紜，殆使人嘆觀止焉。」便可知其人涉獵豐富；而之所以可以遍覽群書，除了與在東京大學受學，可以就近利用相關圖書外，久保天隨後來擔任皇室圖書寮的編修官，更能看到許多稀有圖書，參見久保舜一〈久保天隨〉，頁 382。

⁵⁰ 久保天隨是個「酒豪」，但據其子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所述，在其四十歲以後，因為高血壓，醫師乃建議禁酒，見頁 383，不過實際如果細覽後來的詩作，將會發現詩人依然未曾遠離「酒」。

⁵¹ 參見從宜生（即吳守禮）〈「臺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文載《臺大校友雙月刊》（台北：國立臺灣大學，2001.11），頁 17。

⁵² 參見林無玷《閩中游草》序言，頁 2。

⁵³ 語見神田喜一郎《秋碧吟廬詩鈔》戊籤之序言，不記頁次。

⁵⁴ 語見陳衍《閩中游草》之序言，頁 1。

正典，這或許是其人能享譽日本詩壇的關鍵所在；甚至於乍覽其人在日本國內所寫各種遊歷之詩，雖然所記地景、地貌乃屬於日本所產，但由於詩歌熟練挪用各種中國詩典，或巧妙轉化前賢佳句，反而一時令人迷惘，難以理解此實為日本詠景之作，如其《秋碧吟廬詩鈔》甲籤〈東京四時詞二十四首次達澤菖水韻〉，茲舉二例如下：

洗盡芳塵綠作叢，雨晴清晝度薰風。千株躑躅住餘照，到映池心魚影紅日比谷。

（卷一，頁5）

俯瞰明月湧江心，橋上追涼夜正深。乍有畫船移櫂去，溶溶波碎一川金兩國橋。

（卷一，頁6）

由於詩歌中缺乏明顯的「日本味道」，導致位於東京的日比谷與兩國橋，其空間特徵與風土意韻被淡化，因此無法營造出屬於日本獨特的在地景觀趣味與美感。

然而，久保天隨固然以此類詩作而稱雄、擅場，但其實內心並不以「神似」中國漢詩，或「蕭規曹隨」而滿足，詩人很早就有要與中國競技，以及在日本獨樹一幟、開創新猷的念頭，例如其在書寫〈集陶二十四首〉時，曾經言及：

集句蓋自宋人始，逢雲裁月本為詩家一遊戲，降至明代漸盛，而清初黃□（造字）堂專以此名家。若夫集陶句者，首屈指於元遺山雜著五首。予謂凡集句者，與原作古今別體、散對殊格，務標新意而後始可矜匠心之工也。陶詩限五古，今奪其句，襲其體，所謂屋下架屋者，何所取乎？清詩別裁集載戴本孝律陶五首，……幾有天衣無縫之妙，顧易亦有律陶八首，稍遜其工。吾邦詩家為集句者，古來寥寥，豈非藝苑一缺典耶？今茲乙卯新春，予游涵山，閒中得集陶五律二十四首，選體極嚴，略盡其變而止，乃因靖節出處而次第之。……⁵⁵

透過此段陳述，可知久保天隨不僅對於中國「集句」傳統甚為知悉，且有關「集陶」詩家之表現良窳亦甚熟稔，就在如此的情況下，他的「集陶」詩二十四首，在深化、轉變中國「集陶」原有的操作規範之餘，還成功達成了填補日本詩壇相關創作面向的不足，且又顯現了得與中國前賢範式互別苗頭、彼此頡頏的本事。

而除了以美學方式來完成對中國漢詩的超克，進以間接坐實日本漢詩與中國漢詩的差異性外，前雖述及久保天隨在日本國內之詩作「日本在地意識」不足，然而若觀諸其海外創作，則能了然於其人「日本本位意識」之強烈，且亦有與日本帝國主義有所勾連者。當大正十一年（1922）其前往朝鮮一遊時，途經朝鮮忠清道平澤縣東南的「成歡驛」，這是漢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但同時更是昔年甲午戰爭時，清朝北洋海軍護航艦隊與日本艦隊作戰之區域，久保天隨留下〈成歡驛〉一詩：

礮火舊道戰聲壯，兩軍成陣地形曠。……我軍進欲奪要衝，大尉先登亂流過。一丸飛來洞其胸，大尉斃，萬卒憤。敵兵已殲屠，敵壘已蓋粉。爾後三十寒暑更，俯仰乾坤獨愴情。想見遺恨一聲膽破裂，丈夫報國死猶生。……大尉功勳留汗青，往事歷歷如前日。（《槿域游草》，頁2）

⁵⁵ 語見《秋碧吟廬詩鈔》甲籤，卷三，頁2。

此詩既為「成歡驛戰場」覽古而作，也為憑弔為國捐軀的太尉而發，在「太尉功勳留汗青」的歷史評價中，明白確立了為日本國家盡忠的崇高意義。其他又如《遼瀋游草》中的〈獨立門〉一詩：

獨立門，……獨立之義果何如，可憐事大終自誤。桑椹合一無間然，卻怪當初漫疑懼。獨立門，今如故。門外車馬來往頻，黃塵暗天空朝暮。……（頁3）

獨立門，原名「迎恩門」，本為朝鮮藩王為歡迎中國遠來之欽差而設，門上「迎恩門」三字牌匾係明朝官員所題寫，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戰敗，朝鮮獲致名義上的獨立，遂改此門為「獨立門」。詩中，久保天隨先從「獨立門」的釋義起筆，揭露了當年朝鮮脫離清國而獲致獨立的重大意義，然而獨立後的朝鮮卻未能與日本相互合作，甚至 1919 年又爆發了日韓合併之後爭取獨立的「三一事件」（萬歲事件），如今（1925 年）來到此地，獨立門雖依然如故，卻是黃塵遮空，徒留憾恨。

接著，在離開朝鮮之後，他又渡過鴨綠江，經過奉天、撫順，而後來到哈爾濱，並於此寫下〈哈爾濱車站有懷故伊藤春畝公〉一詩，詩中對於 1909 年 10 月，為解決日俄爭端，來到中國東北與俄國財政總長談判的伊藤博文（1841-1909），其乘坐火車在 10 月 26 日 9 時抵達哈爾濱車站時，竟被朝鮮安重根（1879-1910）刺殺身亡之事，表達諸多悲慨。詩歌有云：

白日無光雲蓬勃，陰風北來寒徹骨。何物韓豎漫跳梁，短銃在拳倏三發。……骸如退蟬血如海，一去英魂呼不回。……晚任統監航槿域，容易八道斂妖氛。……末路壯烈泣鬼神，……。（頁15）

久保天隨以「韓豎」指稱安重根，並用「跳梁」來形容暗殺之舉措，語氣顯然十分不屑，相較對於伊藤博文「英魂」之景仰與竭力刻畫，實有雲泥之別。

另外，不同於前面在朝鮮、遼瀋等地慣用的微詞暗諷修辭方式，久保天隨《琉球游草》中的〈首里王城〉，則是以直接正面歌頌的態度，稱揚琉球成為日本領地之後，日皇收藩治理的亮眼政績，所謂：「先皇馭海宇，郡縣新設置。……遐荒聲教覃，喜值太平治。」（頁6）即可見一斑。

綜合久保天隨上面諸詩要義，可以發現其人在跨越日本國境，遠赴其他日本領地、殖民地或租借區時，所潛藏的日本主體意識或日本帝國主義，便會不期然出現詩中，這竟成了其人讀來雖無「和臭」的漢詩裡，卻最為道地的「日本味」。則如此，以久保天隨所具有的日本本位意識的國族認同狀態，當其人其詩在東亞各地穿梭，並以「日本漢詩」做為穿越東亞不同地區的言說工具時，固然「漢文不振」的共命感可以聯繫眾人的漢文化情感，但在交錯的文化「間」性中，日本漢詩究係溝通、交往的媒介，或更可能是某種「話語」權力的彰顯？答案還不止於此，由於日本與當時其他東亞地區之間，存有縱錯複雜的統治或對待關係，因此如 1932 年久保天隨希望福建名詩人陳衍為《澎湖游草》作序時，陳衍便對中、日當時「兩國失和，連歲兵連禍結」，以為不是「樽俎縞紵之時」，頗有不欲為久保天隨寫序之意，但最後因為考量久保天隨曾有前來福州到訪之誼，而且當時還為《閩中游草》作序，

故於本文中乃援用了《左傳》中晉、楚交戰前後，欒鍼、子重彼此接觸互動的事例，並暗示了自己此次作序的態度。所以，令人深思的是，在當時日治時代的東亞局勢中，日本的「漢詩」在漢字圈裡，雖可促進異地、異文化的交流、互動與接觸，然而一旦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甚至是軍國主義，則其效用性的侷促便會立刻顯現，且只有更增添「同文關係」的尷尬而已。

參、「教授詩人」來臺灣

在理解了久保天隨的生平梗概、漢詩技藝，乃至於其人的「漢詩」文學／文化／政治意義後；那麼，對於這樣一位滿腹學識，但又時有懷才不遇之嘆的日本漢詩名家，在其成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後，隨著他的到來，究竟會與臺灣產生怎樣的互動過程？「臺灣」在其眼中又有何意義？

(一)

要溯及久保天隨與臺灣的關係，首先當從其來臺原因談起。依據本文前面曾經引述過的一篇昭和9年6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由於久保天隨之父生前曾經任職臺東廳，故先生後來遂有來臺憑弔先人服官舊跡的動機⁵⁶，這是其人之所以會前來臺灣的遠因。而若再參見當時其他新聞訊息，可以獲知在1928年2月27日⁵⁷初次抵臺時，久保天隨雖曾將這趟臺灣之旅定位為「單純的觀光」⁵⁸，但因刻在擔任宮內省圖書寮編修官，故也不乏「來臺灣考古視察」的目的⁵⁹，此或可屬另一種來臺的近因。

而此初次旅臺之行，久保天隨遊覽了台北、嘉義、台南等地⁶⁰，且獲致總督上山滿之進（1869-1938）之熱誠款待，招宴於東門官邸，並由在臺日人小松天籟、豬口鳳菴、尾崎古邨等能詩者作陪；席中，總督力勸剛剛於1927年以「西廂記之研究」取得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的久保天隨能來就職為臺大教授⁶¹。顯然，上山滿之進的邀請十分成功，因為次年（1929）久保天隨便攜眷來臺，就此展開在臺教育英才的生涯，成為了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的首任教授，總計直到昭和九年（1934）病逝止，先生前後客寓臺灣達五年餘。那麼，臺灣與久保天隨的「關係性」如何？對於這位魏清德所稱「清貴」⁶²的教授詩人，或是謝雪漁所稱的「學閥」⁶³，

⁵⁶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夕刊）第12272號（四）。

⁵⁷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2月28日（五）。

⁵⁸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2月28日（五）。

⁵⁹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3月12日（系刊）（四）。

⁶⁰ 關於久保天隨從台北出發，到嘉義、台南等地觀光，之後又返回台北的詳細行程規劃與路線安排，可以參看昭和3年3月1日系刊（四）、昭和3年3月3日系刊（四）、昭和3年3月5日（四）、昭和3年3月12日（四）等《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⁶¹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夕刊）第12272號（四）。不過，若依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2月28日（五）報載訊息，當時就已有傳聞久保天隨會在次年春天來任臺灣大學教授，且這個傳聞的時間遠比久保天隨來臺之後，上山滿之進藉由飲宴而提出邀請來臺任教的消息更早，則可見雙方應該早已有所接洽。

⁶² 魏清德用「清貴」來形容久保天隨擁有圖書寮編纂官及帝大教授的身份特質。語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12日（八）。

前進「臺灣」的意義又何在？

早在 1901 年出版的《塵中放言》中，先生所撰〈羈旅の詩趣〉一文，便敘及旅行對於詩趣激發的重要性，故他對於臺、澎等地成為日本新收復的版圖別有感觸，認為如此可以使大家看到許多熱帶圈裡的景象，所以他在文中還寫出了「當我們爬上新高山的絕頂，感受浩浩之天風」的快意文字，甚至更在文章末尾留下感性語句：「我單執筆至此，就已神遊了」⁶⁴。由此可見，臺灣對於久保天隨而言，在其早年的想像之中，這裡已是一個應該一探究竟的熱帶圈所在，而且也將會是裨益其人詩歌靈感汨汨而發的新生樂園。

一旦渡海來臺之後，誠如久保天隨長子「久保舜一」所述，「臺北時代」其實是五十五歲的詩人一生中，心境較為舒緩平和、生活餘裕的時刻⁶⁵，所以當上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的久保天隨，不僅隨即展開臺灣全島旅行，他甚且藉由地利之便，順道從臺灣動身前往中國福建、澎湖與琉球遊覽，而後面這幾處地方的遊歷所得，尚有詩集出版⁶⁶；是以若從久保天隨的旅行史而言，則臺灣的地理位置，促使詩人有了較佳的「南進」旅遊契機，且有助留下更多屬於熱帶圈景象之描寫，使其創作面向為之擴增與變化，則顯然臺灣之行對詩人而言意義重大，謝雪漁在寫給久保天隨的詩中，言及「南疆風物可補詩鈔」，應該是看出了箇中意涵⁶⁷。

至於其人在臺灣島內的旅遊情形，單以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遊歷詩作的詩題來看，便可發現在臺期間，久保天隨之足跡前後至少行經基隆、台北、烏來、鵝鑾鼻、台南、新店溪、北投、彰化、鹿港、新竹北郭園、潛園、阿里山、水社、涵碧樓、日月潭、埔里、眉溪、霧社、台中、角板山、金瓜石、瑞芳、大甲溪、草山、宜蘭、員山、礁溪、龜山嶼……等地⁶⁸，如此廣泛的遊臺範圍，相較早期來臺者如初山衣洲、中村櫻溪、館森鴻……等人較侷限於臺灣北部的行蹤，實具有不同的意義，其對臺灣之認識論亦產生差異。而上述臺灣各地的空間、景觀，便一一再現於詩人作品中，在創作時多數的內容乃是採取客觀描摹的詠景方式完成，但如同在日本時期階段的作品，其歷史意識與覽古興懷，也會不時夾雜、蘊含其間，而這除了是前面已經敘述過的原先詩人本身的創作特質外，其在臺灣曾經擔任「臺灣

⁶³ 語出謝雪漁〈次久保天隨博士移居龍安坡原韻〉，原詩共有四首，其二有謂：「東國文明開學閥，南疆風物補詩鈔」，參見氏著《雪漁詩集·奎府樓詩草》（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25。

⁶⁴ 以上，參見久保天隨〈羈旅の詩趣〉，文章收入久松潛一編《鹽井兩江 武島羽衣 大町桂月 久保天隨 笹川臨風 樋口龍峽集》，頁 233。

⁶⁵ 參見久保舜一〈久保天隨〉一文，頁 383。但即便如此，久保天隨還是有拙於身計、離鄉思家的感傷，甚至貧窮、不遇之嘆，這種情形連謝雪漁都感詫異，其在久保天隨過世之後所寫〈悼久保天隨博士〉便言及：「廣文溫飽六千俸，尚有才人不遇嘆」，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6 月 12 日（八）。至於其在臺灣最常傾訴心緒、吐露苦水的對象是楊孝儂，所作〈次韻楊君笑儂遺懷四首〉、〈次韻楊君笑儂遺懷四首〉、〈書懷四首次韻楊君笑儂〉、〈雜感次韻楊君笑儂〉、〈春日書懷次韻楊君笑儂〉、〈疊韻酬楊笑儂見寄〉幾乎都是詠懷言志之作，最能顯示久保天隨在臺的心情。然而此類抒發心情為主要的作品，在久保天隨的《秋碧吟廬詩鈔》或各類「游草」中都是罕見的，何以在臺灣與楊笑儂的唱酬之間，屢屢出現言情的漢詩，此與因為處於臺灣，而臺灣漢詩本就有抒情傳統是否攸關，值得細究。

⁶⁶ 即《閩中游草》、《澎湖游草》、《琉球游草》。

⁶⁷ 語出謝雪漁〈次久保天隨博士移居龍安坡原韻〉，同注 63。

⁶⁸ 參見黃美娥編著《日治時期台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台北：台北文獻委員會，2003）（下）「久保得二」條，頁 774-796。只是，報紙中的多數詩作，並未見收於其人最後一本刊行的詩集《秋碧吟廬詩鈔》戊籤中，換句話說，在《秋碧吟廬詩鈔》戊籤中的「臺灣書寫」僅是局部，而非全貌。此外，這些刊載於臺灣報刊的作品，由於多數作品曾經臺灣日日新報社之編輯，如魏清德之評點說明，因此有助於理解久保天隨的撰寫技巧；而對於臺灣讀者而言，因為久保天隨身份的特殊，故同時也具有展示昭和時期日本漢詩正典的作用性。那麼，對於臺灣報刊上的這些作品的重視，將有助於久保天隨漢詩創作史、詩歌美學表現的掌握，也能對日、台漢詩互動的了解有所助益。

史料編纂會委員」⁶⁹，應該也會強化其人更加注重臺灣歷史與景觀、名勝之間的結合性。

(二)

臺灣地域景觀的新異，固然增益、開闊了久保天隨漢詩寫作的題材、視域，但對於詩人而言，來臺的意義並不止於此，正如同昭和三年（1928）年2月27日他首次來到臺灣觀光時，當時在基隆港口的船上甲板便對採訪的記者表達了「希望做為詩人，我輩名聲能夠從本島到內地廣為人知」的心願一般⁷⁰；是以，「臺灣」此一地點的出現，其在久保天隨的漢詩空間世界裡，除了探險、冒險、旅遊與增加詩趣審美之外，猶有一份得以漢詩博取更多美名的「征服」意義。而事實是，揆諸日本在臺漢詩史的發展脈絡，久保天隨的到來，顯然是被寄予厚望的。大正十五年（1926），時任總督的上山滿之進曾經邀請當時日本國內詩壇最負盛名的國分青厓來臺，立意促進內、臺人在文藝上的親善，但其實不無宣示日本漢詩正宗及確立典律性的儀式化意義；唯相較於國分青厓的短暫來臺，在上山滿之進的力邀下，與國分青厓並列大正、昭和時期日本三大漢詩人之一的久保天隨來臺任教、客居，其影響性自然會超過短期停留的國分青厓，更何況久保天隨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而後歷經大學院之深造，再憑藉高深的戲曲研究學問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因此兼通漢學素養與文學研究的難得經歷與學養，代表了昭和時期來臺日本漢文人中的最高典範，上山滿之進的邀請與安排顯然極富深意。

來臺之後的久保天隨，一方面對於臺灣漢詩壇頗為留意，同時也不忘觀察自我在臺灣漢詩界的位置與角色。昭和五年（1930）楊笑儂〈久保天隨先生惠贈大著詩話一卷賦此鳴謝〉寫道：「等身著作如公少，管領風騷合策勳。（四首之二）」、「眼中莫怪無餘子，抗手騷壇竟有誰。他日赤松容小隱，執鞭我亦願追隨。（四首之三）」在此二詩中，楊氏頌揚久保天隨著作等身，認為騷壇無人能與其相抗。緊接著，久保天隨〈次韻酬楊君笑儂〉便做了如下回應：「眼中餘子元無幾，身後知音果屬誰？（四首之三）」⁷¹於是，就在楊笑儂意欲奉久保氏為師，而久保天隨要將楊氏視為知音⁷²的唱酬中，更加強化了二人認為當今騷壇無人能與久保天隨匹敵的事實。而關於久保氏的自期或自我定評，從其十天之後再次發表的〈重次韻楊君笑儂遺懷四首〉中，「一自病軀辭酒國，仍將餘力護詞壇。（四首之二）」、「借問蓬萊仙世界，主盟今日屬何人？（四首之四）」⁷³更有了明顯表達，雖然身在臺灣的此刻，自己已是五十餘歲的詩人，年華早去、身屬病軀，但努力維護、鞏固詞壇的壯志猶在，且所謂臺灣詩壇第一人之姿，何嘗不是了然於心，且昭然若揭。

當然，久保天隨在日本漢文學界的地位，臺人其實早有所知，也表尊崇，所以

⁶⁹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6月4日（七）。

⁷⁰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2月28日（五）。

⁷¹ 以上楊笑儂及久保天隨之唱和詩，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5年6月12日第10832號（四）。

⁷² 久保天隨在臺灣時，較常與其有所互動的詩人多半是在臺日人，主要是「南雅社」的詩人，相形之下，臺灣文人與其互動似乎有限，除一樣有加入「南雅社」的臺人魏清德、謝雪漁……等人外，與其最為親近者便是楊笑儂，註65已經述及兩人關係。不過整體而言，久保天隨似乎不善與人交，謝雪漁〈次久保天隨博士移居龍安坡原韻〉有言：「海嶠知交今亦少，孤吟抱膝對寒缸。」而這可能與其個性有關，在謝氏此詩中就提到了「苔痕屐齒應嫌印，不許柴扉野客敲。」可見一斑。又，謝雪漁詩收於氏著《雪漁詩集·奎府樓詩草》（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25。

⁷³ 詩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5年6月24日第10844號（四）。

遠在早期其未來臺之前，大著《支那文學史》一書，就已經在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十八日上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長期刊載，至隔年三月十九日止雖未竟登，但卻也已連載長達一百五十回，當時譯者是謝雪漁。那麼，如今這位被禮聘而來，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負責講授東洋文學，又具有文學博士學位，且秉持著「主盟今日屬何人」的自信、傲氣的日本漢詩人，能否為臺灣古典詩壇帶來更多生機？尤其依據日治時代《臺灣日日新報》所載，久保天隨在臺灣時，除了漢詩界同好之外，幾乎不參與社交界⁷⁴，可見其對漢詩之執著與深情，則其一向意欲提振漢文的理想壯志，能否在南來臺灣時獲致實現，並與臺灣漢文人相互扶持？這一段屬於久保天隨晚年最後的文學活動生涯，又會是何種面貌？臺灣的傳統詩壇、詩人們，對其有何看法？相對地，臺灣漢詩壇是否會受到其人其作的刺激與影響？以下的觀察，將鎖定昭和時期臺灣漢詩場域加以說明。

肆、久保天隨與昭和時期臺灣漢詩壇

久保天隨在臺灣，應是獲致臺灣漢詩界之尊重與推崇的，此可由創刊於昭和五年（1930）十月，代表臺灣詩社與古典漢詩界最為重要的《詩報》，曾極力邀請久保天隨擔任顧問一事，得以獲致蠡測。在昭和六年（1931）年三月的《詩報》上曾經出現過如下文字：「本報自前承各吟社友推舉漢詩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久保天隨先生為我顧問，至近始得其惠諾，本報為增光不少。⁷⁵」藉此可知，臺灣漢詩界實際試圖增進與久保天隨之接觸與互動，甚至企望久保天隨能擔任指導者的角色，以提攜臺灣漢詩壇；而所謂的「各吟社友」的推舉，更著實反映了臺人的熱切期盼。只是，耐人玩味的是，字裡行間似乎頗有玄機，久保天隨顯非爽快應允，那麼久保氏的遲遲不惠諾，原因為何呢？而這樣的訊息，是否暗指了久保天隨與臺灣詩界間其實存有隔閡或齟齬？這位清貴的教授詩人、學閥，究竟在昭和時期的臺灣漢詩壇發生怎樣的故事？

或許，再藉由昭和八年（1933）印行的《瀛洲詩集》中，久保天隨的一篇序文，可以提供我們更多想像空間。昭和七年（1932）臺灣全島詩人大會在台北孔廟召開，參與者高達二百餘人，此次盛會之後，瀛社社員林欽賜決定揀擇名吟會前茅者的作品，當日參謁孔廟者所做之詩，以及作者窻稿若干，擬一起彙集為「瀛洲詩集」加以出版。出版前，林氏求序於久保天隨、羅秀惠及魏清德三人，但有意思的是，這三篇序文各顯微妙，意旨遙深，且明顯流露出日、臺之間的漢詩較勁意味，甚至出現某種緊張關係，實在耐人尋思。翻閱該詩集，首篇所刊即是久保天隨之作，他在文中表示如下意見：

臺灣露我王化既近四十年，耆宿凋謝幾盡，當日孩嬰方見鬢霜，或謂新教育大行而社學廢絕，少壯之人往往不誦聖經賢傳，以是其言文卻有輪舊者。今也臺疆吟社以十數，而以詩名家者寥寥如晨星。嗚呼！自社亭、鶴山輩之逝，天南秀靈之氣消沈日久，文彩風流不可復見矣。今茲壬申三月，全島詩客二

⁷⁴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6月3日第12272號（二）。

⁷⁵ 參見《詩報》昭和6年3月16日第8號，頁16。又，另一位受聘為顧問者為小松吉久，他在昭和6年1月出任顧問。

百餘人，大會於臺北，觴詠累日，齊挾生花之筆，爭矜吐鳳之才，逸志凌雲，鏘聲擲地，獲詩數百篇。瀛社員林君欽賜編成一卷，將壽梓行世，因囑予序，予曩受邀而以病不能出，幸因此集，臆度席上唱酬之盛，洵不勝欽羨之至。但卷中所收，雖字堆錦繡、篇競月霜，至典裁清拔、詞彩雅贍者，十指未足屈盡，予於是益信前言不謬，其振起大雅遺音，發揚正聲純氣，蓋猶有待矣。竊念彼受新教育者，晨夕攻究漢學，誦習經傳，固其根柢，高其才力，興至執筆，神完氣厚，則銜官屈宋、奴僕離騷，未必為難事，而此集續刊有愈可觀者，亦何疑之有？吾曹不作詩則已，苟作詩誓當至茲境地，昔者高達夫年五十而始學詩，予雖老矣，希與諸君從事於此，能碌碌無為而了斯生哉！⁷⁶

這篇在文章末尾還特別標誌是在昭和七年六月「始政記念日」完稿的序文，文意曲折，寄寓甚深，至少包括了幾項重點：其一，臺灣今日騷壇已經沒有如鄭用錫、林占梅之名家，全臺詩社雖多，能詩者實鮮；其二，有關臺灣詩界之衰頹，或謂日本推動新學教育所致，但久保氏以為此次全島詩人大會人數如此之多，集中卻還乏善可陳的情況來看，故知原因自不在此；其三，他認為新學、漢學並不相斥，反而合則雙美，且受新學者要熟諳漢學，亦非難事。最末，又重申對於此次臺灣全島詩人大會的創作成果頗感不滿，並且強烈暗示臺灣詩人千萬不要「碌碌無為而了斯生」。

這篇砲聲隆隆的序文，其實更像是一篇火力四射的檄文，既然日、臺漢詩的優劣不言而喻，又如何能相互攜手合力解決漢文危機？尤其不堪的是，在代表學院派的帝國詩人眼中，這些全臺詩會吟友之作竟如敝屣，所謂「十指未足屈盡」更顯屈辱。然則，久保天隨之未能參與詩人大會，究係「因病」或「稱病」？而面對這篇極具輕蔑與不屑語氣的序文，臺灣漢詩界如何因應？作何反應？

我們今日藉由《瀛洲詩集》其他序文或跋文的內容顯示，可以相當程度懷疑主編此書的林欽賜，在看到久保天隨的序文之後，其實做了適度的處理，於茲可從台南舉人羅秀惠的另篇序文瞧出端倪：

先進禮樂，不失野人，叢爾臺灣，文化已古。未至其地者，謬以蕃產外無長物也；即視為殖民者，亦殆謂荒煙中悉蠻草也。豈知東瀛別有天地，天籟自鳴，採風時復軒輊，軒輊互見，遽以土分剪革，疵索吹毛，不亦慎乎！是故天囿一方，霧迷五里，後之對岸來者，往往揚颿得意，詡辨妃稀，倚馬自高，未窺班豹。然而山川蒼莽，蔚為文章，太守流風，解嘲牛馬，雖比者漢文寢廢，學殖就荒，結習未忘，束書仍在，勇猶足賈，詩可以興，縱江河其日下，猶不至瓦缶之雷鳴。今林君欽賜瀛洲詩集之輯，信手拈來，愜心適當，意存實錄，不事誇張。篇什抒寫，菁華人文，萃拔優秀，冀通聲氣，附以寫真，箇中有人，呼之欲出，不假雕飾，表示性靈。倘開卷披吟，便如同親歷，庶幾蓬萊清淺，供作導遊之船，或者風雨興懷，恍對剪燭之話。應知海隅孤島，猶留美麗之遺名；漫侶世外漁樵，尚整風騷之餘韻。⁷⁷

以上，這篇文章充滿反唇相譏之意味，通篇意在反撥臺灣漢詩界之形象。文中，羅

⁷⁶ 參見久保得二為《瀛洲詩集》所寫序文，收入林欽賜編《瀛洲詩集》（台北：自印本，昭和8年），不計頁次。

⁷⁷ 出處同上，不計頁次。

氏先是肯定臺灣禮樂文化自古仍存，以為即使近來漢文淒廢，但臺人學殖涵養未失，且本次詩會作品結集出版除了可供互通聲氣之用外，羅氏認為還是具有展現臺灣漢詩實力的意義，臺灣島依舊充滿了美麗的詩騷餘韻。其次，他還要指出某些「殖民者」迄今仍視臺灣為荒煙蠻草之域的心態實在荒謬，以及「來之對岸者」自鳴得意之舉，是因認識臺灣不清的結果。

綜上，此二則意旨迥異，態度南轅北轍的序文，竟同時出現於一本詩集之中，則更令人感知到昭和時期臺灣的漢詩壇，所出現的日、台漢詩人的對峙氛圍與緊張競爭關係。若然，則久保天隨所挾著的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的學術位階，不僅難以發揮提攜、改進臺灣漢詩界，促進日、臺漢詩交流之效，而其欲成為臺灣漢詩界權威仲裁者、指導者的立場與心態，甚至還會導致雙方的不信任感。

不過，上述久保天隨與羅秀惠之爭，其實還有一值得推敲之處，因為此二序文也指向了「日本東京帝大文學博士」與「清代臺灣舉人」之暗中角力、較勁情形，且由於雙方背景身份與學養知識來源的差異，遂也涉及了新學/舊學彼此頡頏的問題，如此則又進一步連結到了臺灣漢詩的破敗、衰頹，或能維繫不墜，是來自於新、舊學的教育問題嗎？到底，日本引進的新學，是否是導致臺灣漢文危機的劊子手呢？當久保天隨在試圖辯解的同時，恰恰指出了臺灣漢文人的疑惑與不滿。

然而，此時的久保天隨，其處境其實也是矛盾而難為，參酌神田喜一郎在《秋碧吟廬詩鈔》戊籤中所做序文，他特別談到：

自東京帝國大學設漢學科，以崇實學，儒林人士，各信師承，左經右史，專門名家，旁采泰西學術，彌不以新銳精神融會之。海內學風為之一變。然風會所趨，專以考競相標，不復以詞翰為事。

所以，如果如神田喜一郎所說，則久保天隨在日本實是不合於時代潮流的追逐「詞翰」者；但其一旦到了臺灣，由於臺灣傳統漢詩文之衰頹問題，在漢文人心中，又被視為是殖民者的新學／實學政策所致。那麼，出身東京大學漢學科，乃至獲致東大文學博士的久保氏，其本身無疑又成了代表了「新學者」的一方，故其想要選擇折衷新、舊學的態度與立場，頓時又顯得曖昧而矛盾。至此，如果從日本學術發展來看臺灣的漢詩發展，則久保天隨所謂「教授詩人」、「學閥」的角色反而難以著力，而欲經由久保天隨拉近日、臺兩地漢詩界的距離，甚至促成日、臺漢文藝上的親善共融夢想，也有其困難之處；再者，若就久保天隨心理層面著眼，只怕從日本到臺灣，其所秉持的「漢詩」觀，依舊還是因為與本地格格不入，只能繼續孤單奮鬥，註定落寞。

當然，可以令久保天隨差可告慰的是，其人的詩歌美學觀、創作趨勢，或是具有學院派「新學」專業典範的「漢詩人」形象，其實在昭和時期的臺灣漢詩壇，也已取得一些迴響與應和；易言之，這代表了部分的臺灣漢詩人，其所選擇的位置與羅秀惠並不一致。例如《瀛洲詩集》第三篇由魏清德所寫的序文，原本依照文末標註的撰寫時間是在「昭和壬申荔月」，則其較諸羅秀惠為早，於理其文或可置於羅文之前，結果卻被放於末篇⁷⁸，且內容還具有幾分調和久保天隨、羅秀惠的折衷論的用意，則如此更顯林欽賜之苦心姑詣。魏氏在文中，先從臺灣擊鉢詩會的意義與

⁷⁸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是因魏清德年紀較輕所致；但即使如此，其序文意見仍舊是居於久保天隨與羅秀惠之間，對於臺灣漢詩有肯定、有批評，顯示了另一種評價與觀看的模式。

弊端談起，一面肯定吟會的存在，「便於互通聲氣，提唱斯文，挽狂瀾於既倒」；但另一方面，則言「然於詩之能事，實未易畢也，大抵擊鉢吟先題後詩，多限絕律，非囿於題面之刻畫，即揣摩選者所好，非如弔古覽勝樂府歌行之作，感時撫事，或興到筆隨，直抒胸臆，有足以動人者也。」最後又提出詩人可取徑臺灣獨特之山水，以及「歷代昇降，世變紛岐，民間庶政之利病得失歷史」做為詩歌材料，並且再參看眾家詩學，自然就能成就臺灣詩壇之大進步。故，不同於久保天隨對臺灣漢詩的全盤否定，魏清德先是指出詩歌吟會的意義，但隨後所提的針貶之道，特別是要效法「弔古覽勝樂府歌行之作」的方向，細究之實是久保天隨詩歌創作之重要趨向，關於此點，本文於前曾經披露。那麼，顯然魏清德在輕描淡寫之中，其所展示的卻反而是對於久保天隨漢詩書寫範式的接納了。

同樣可堪玩味的，還有《瀛洲詩集》中台北景美文人林佛國所寫的跋文。他認為此次全島詩人大會「我臺詩人之聲氣聯絡可為廣矣，大成則未未也」，因此倡言臺灣漢詩界應配合現代時勢進行改造，最終並發出慨嘆之語，以為「若夫不講學術，不窮治理，不問事業，獨拘拘以事夫庸眾人之所謂詩者，難保不舉群有為之士，相與沈淪於九淵之下，尤有心人之所深憂也。」文中的此段話語，已然將漢詩與新學/實學勾連，頗有與久保天隨之旨遙相呼應的現象，而其所謂不從學術、不窮治理的庸眾人之詩，所指又是何者呢？在林佛國此文中，可以發現，昭和時期的臺灣漢詩界中從事漢詩寫作者，應該已經出現兩派人士，其一向新學靠攏，其二仍偏於舊學；而從久保天隨、羅秀惠到魏清德、林佛國等人之見，清楚昭示了臺灣漢詩壇的知識社會結構實際已經有所分化，且有對立緊張關係出現。如斯的現象，無疑也提醒了吾人，關於日本漢詩人如久保天隨一類人物的在臺位置與角色意義，雖然其人同樣要與臺灣漢文人一同扶振漢詩文，但在現代知識、教育學科等學術因素，以及殖民主義的干擾下，臺灣漢詩壇已非單一樣態，漢文人群自身的差異面貌已然浮現，則不難想見的，日、臺之間的漢文合作之路勢必蜿蜒而曲折，甚而難行了。

伍、「南雅詩社」的文學／政治意義

以上，在前一單元中，論及了久保天隨和臺灣漢詩壇的互動情形，以及因之而產生的日、臺漢文緊張關係狀態，然而除此之外，其在 1930 年所成立的傳統漢詩社「南雅詩社」的文學政治意義，同樣不宜忽視。此一詩社，是久保天隨來臺任教次年所設，直到 1934 年詩人病逝後停止活動，創立之初便由先生擔任社長一職，社員有伊藤壺溪、尾崎秀真、柳田陵村、西川萱南、山口東軒、神田鬯齋、豬口鳳庵、小松天籟、大西笠峰、大浦思齊，以及臺人魏清德⁷⁹，後來又加入了賀來成軒、三屋清陰、渡邊直峰等，但中間也有社員因返鄉而無法繼續參與活動；大抵，這是一個以日本文人為主幹的詩社，詩社同仁的作品每年輯錄一卷出版，名為《南雅集》。

事實上，「南雅詩社」就日治時代日本在臺漢文學史而言，具有非常重大之意義。一方面，此為目前所知日人在臺末期的最後一個漢詩社，標誌了在臺日人漢詩社的結束終了；但另一方面在其創立之時，則又承繼了日本治臺初期以來所開啟的

⁷⁹ 從相關報刊中所可見的南雅詩社活動資訊，或《南雅集》內容來看，南雅詩社詩會活動也曾有過一些臺灣文人參與，然而真正成為社員者，依然僅有魏清德一人。

漢詩吟詠傳統而深受肯定，此誠如尾崎秀真在〈南雅集〉第三集刊行序言的觀察，他以「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的親身目睹經歷，指出「改隸之際邦人來臺者，概能詩」，包括殿下、將軍、官僚與文士，或託志吟詠，或開雅會，故奎運駸駸而盛，但明治後期若干文人相繼東歸，風流遂歇；直到大正末期，總督上山滿之進邀請國分青厓、勝島仙坡來臺，才重興坵壇、風月頓新，而到了久保天隨來臺，極力鼓吹成立南雅詩社後，尾崎氏至此真正覺得「幸哉斯文未喪」⁸⁰，足見在其心中，「南雅詩社」扮演著延續日本在臺漢詩命脈的重要角色意義。唯不僅於此，若就久保天隨本人來說，這其實更有不讓臺人詩社獨美於前的意味，他在《南雅集》第二卷前之序言有謂：「……方今全島詩社可以十算，文采風流朗映一時，嗚呼盛哉！顧內人來寓於此者，絕不相關，是我南雅詩社之所以興也！」因此，藉由成立一個日本漢詩社，除了可與當時島內臺灣詩社盛況相聯繫、相對話，更要證明日人亦有精擅此道者，且內地本有詩社傳統，應將之引入臺島，進與臺灣詩社互動、相抗或交流。

那麼，「南雅詩社」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詩社？其與先前日人來臺後所曾設置的文學社群有何異同？而《南雅集》又與明治以來的多種日本官方主導或出版之詩文唱和集的性質、內容有何差別？回顧日治時代以來，日人在臺曾經舉辦過若干大型詩文集會活動，或由總督、官僚主導，或透過文士促成，初期如 1899 年饗老典、1900 年揚文會的撰文和詩，以及 1899 年兒玉源太郎「南菜園」、1904 年後藤新平「鳥松閣」之全臺徵詩；大正時期，1921 年田健治郎總督設宴全臺詩人於東門官邸並有《大雅唱和集》之刊行，1924 年內田嘉吉總督以正月國風御題「新年言志」向全臺詩人徵詩，後亦集結為《新年言志》，另前述上山滿之進總督邀請國分青厓詩翁來臺後，也曾在東門官邸與閩臺名流大開翰墨之筵，並於 1927 年出版《東閣唱和集》。除了總督府官方的正式活動外，日本官吏、文人於私下也組織過若干詩社，如玉山吟社、淡社、穆如吟社、清流吟社等，則日人如此熱衷漢詩的情形具有何等意義？

其實細繹上列情況，除了清楚可見日本漢文學傳播、移入臺灣的真實景象外，其中還頗具文學／文化／政治意涵。過去以來，有關日人在臺漢詩文活動，向被視為與利用漢文進行籠絡、同化目的有關，但若追溯日本漢詩的寫作歷史，則可以發現德川幕府的江戶時期，在日本文學史上，是繼王朝時代之後的第二個漢文黃金時代，此際的社會引發了漢文熱潮，而不再侷限於所謂高官階層，武士和市民上層者也都濡染此風，並且到了明治維新之後還依然如此⁸¹；因此有關日人治理臺灣後，所陸續展開的多項漢詩文集體吟唱、徵集作品，或成立文學社群的現象，何嘗不也是江戶時期以來，日本自身漢文學寫作風潮在海外殖民地的拓展與延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諸多出身內地的官員、文人，來到臺灣之後，由於集體參與詩文活動的機會大增，意外促使原來不同社會階級、地域籍貫、官階身份者，更能進一步泯除差異，共同從事聚集性活動，或組成同一文學社群；因此，相較於日本內地的漢詩史或詩社史，在臺日本漢文學社群也有著某種特殊樣貌。

再者，這些日治初期以來，由日人所引導的各式詩文創作活動、集會或文學社群，其中還存在介入改造臺灣社會，產生與時俱進的文學政治意涵，箇中的歷時性變化尤堪玩味。例如治臺初期與兒玉源太郎有關的幾項詩文活動，包括在臺北、臺

⁸⁰ 以上尾崎秀真之觀察，參見久保天隨閱、南雅詩社同人編《南雅集》第三卷前所附序言，不計頁次，台大圖書館館藏刊本。

⁸¹ 參見加藤徹《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 頁 189、頁 202。

中、臺南所舉辦的慶饗老典，便是利用明清以來臺灣固有的敬老儀典，在舊慣溫存中同時宣揚新政的愛民之風，從〈慶饗老典徵文啟〉中便能略見端倪⁸²；至於揚文會的舉行，依據兒玉源太郎〈揚文會辭〉所述，乃是有感於「改隸帝國版圖之初，戎馬倥傯，未遑文治……現際茲六易星霜，……國運現已盛隆，文運亦期進步，遂計及振興文教而舉行揚文會」的文治社會背景所需，因此「蒐羅文人學士，畢集一堂，……望共贊文明之化」⁸³，而前來參與會議的臺灣文人，總督府事先針對「修保廟宇議」、「旌表節孝議」、「救濟賑恤議」三項命題予以徵稿，意使其人能就地方社會教化問題有所建言，但真正邀請與會的目的，參酌後藤新平演說辭稿，可以瞭解其實更要透過會議的召開，曉諭文人當世除傳統漢文之外，學習與日本國體相聯繫的「國語」更是當務之急，而具實用價值的新學也急需大力推廣，故此會目的之一，在於力促新學、舊學的更替⁸⁴。

此外，兒玉源太郎 1899 年時也曾就其游息之處「南菜園」進行全臺徵詩活動，當時同樣客居南菜園內的初山衣洲，在 1900 年寫就〈南菜園記〉一文，特別剖析了「南菜園」的人文地理空間意涵，藉之有利掌握昔年伴隨徵詩而來的《南菜園唱和集》所顯現的文學政治效應。原來，位於臺北城南古亭莊「竹籬茅舍、豆棚瓜架」的「菜園」式平易住居，其實是總督兒玉源太郎捨棄了在台灣此一新殖民地追逐享受「興平泉金谷之園」燕寢之樂的結果，由於充分體恤臺灣「人心未遑忘其故」的撫民之德，故改以親近江山風月之樂，來替代人工名園的享受⁸⁵；如此一來，兒玉源太郎原本高高在上的總督形象遂被擱置，進而獲致身份轉換、階級泯除，反倒成為了關懷臺灣百姓的田園儒者、隱士，就此重構日、臺官民之間的新互動關係，非唯促使使臺初期以來的抗暴武力氛圍淡化，又因為「南菜園」獨具的「田家」風格，更使全臺徵詩者都圍繞此一特殊的空間象徵而起興聯想，參與徵詩者大多便以歷史上深獲好評臥廬隆中的諸葛武侯，來媲美隱喻南菜園中的總督大人了。如此，則「南菜園」的徵詩之舉，無寧也是兒玉源太郎形象轉換、更新的活動儀式。有趣的是，稍晚數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仿效兒玉源太郎，由木下新三郎、館森鴻、羅秀惠共同發起，為其書齋「鳥松閣」進行徵詩，且徵詩結果，同樣也在為後藤新平塑造新形象，但其面貌卻與兒玉所欲強調的平易親民不同，所展現的是透過閣前牆外兩棵因為時時聚集群鳥棲息而有鳥屎長期沃灌的「鳥松」老樹，其獨挺凌空，不與書齋園中蕉蘭竹楊、百草雜花群植為伍的高大姿態⁸⁶，以比擬突顯後藤新平特出而不凡的氣概。而要再補充的是，前述這種由日方所推動的全臺徵詩活動，本身便具特殊意義，透過了公開的方式，不同身份的臺人皆得參與發表，並且取得與日人共同競技的機會；而相對地，日方亦在藉詩尋求、召喚文學/政治的認同者，故無形之間遂有利於降低雙方的隔閡，進以凝聚彼此的共識。

明治時期結束之後，洎自進入大正時期，由多位總督所舉辦的全臺徵詩，或邀宴臺灣詩人大會，又有了不同以往的活動意涵。以《大雅唱和集》來看，鷹取岳陽在〈大雅唱和集序〉中提到了總督田健治郎於東門官邸宴請臺灣詩人九十六員一事，不僅接續了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離去之後文章倏衰的詩風，而其延請文雅之士與會吟詩，更是彰顯「挖揚風雅之旨」，同時也因為「盍簪之盛，前代未聞」的

⁸² 參見〈慶饗老典徵文啟〉，文見《慶饗老典錄》，1900，頁 21-23。

⁸³ 參見兒玉源太郎〈揚文會辭〉，文見《揚文會》，臺灣總督府發行，臺灣日日新報印，1901。

⁸⁴ 參見後藤新平〈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文見《揚文會》，臺灣總督府發行，臺灣日日新報印刷，1901。

⁸⁵ 參見初山衣洲〈南菜園記〉，文見初山衣洲編《南菜園唱和集》，1900。

⁸⁶ 參見鈴木豹軒〈鳥松閣記〉，文見尾崎秀真編《鳥松閣唱和集》，臺灣日日新報社印刷，1906。

榮景，而愈加顯現了此時真是一個「震鑠古今」的大雅盛世、太平世紀⁸⁷；相近似地，其後內田嘉吉總督在大正十三年（1924）正月的新春徵詩，負責協助彙編的鷹取岳陽在將各地寄來詩作統合成冊後，也表示南瀛文士各攀瑤韻相以唱和的熱烈情況，洵然是「昇平之樂事」的寫照，二者都同樣將徵詩、和詩之舉，與國家太平、國運興隆相聯繫。如此一來，相較於明治時期兒玉與後藤二人，均以私領域的空間象徵系統來構築日、臺詩人交流的新場域，以及進行國家官員形象的塑造、建構工程，則大正之後歷任總督顯然更是藉由國家集體力量，提高漢詩的作用力，進而與國力的展示相結合，漢詩隱然成為盛世的指標；但也為此漢詩無形中有向國家靠攏之勢，所謂「大雅之音」已幾近於朝廷的廟堂之音，民間本該有的眾聲喧嘩逐漸隱沒。無獨有偶的，1926年總督上山滿之進為《東閣唱和集》寫序時，同樣也肯定其所邀來參加吟會者是在揚文挖雅、發出盛世之音，並且強調臺灣改隸已三十年，因為「聖德覃敷，無遠弗屆，雖蠻天箏嶺○○（案：字跡不清楚）亦留詩人題詠，無復所謂畏途者。宜鼓吹休明，以答昭代之化，是集庶足以當之乎？」詩人能自在於島內各地進行題詠，實肇因於治安良好、開發完善所致，是以詩人亦應以詩來歌頌此一政治清明的美好時代⁸⁸。綜上，則總督府在提升島內漢詩地位的同時，卻也灌注了漢詩朝向宣揚日本政權發展的制約力量。

爬梳了從早期以來由總督、官員個人所主導的徵詩、吟會活動的演變意義後，以下則試圖理解日人在臺成立詩社的概況及其意義。唯受限於資料，目前相關詩社，所知多屬創作作品吉光片羽之刊載，其中活動訊息較豐者，仍屬在1896年最早成立的「玉山吟社」⁸⁹。而關於此詩社，中村櫻溪在〈玉山吟社會宴記〉一文中，曾經生動披露了其人參與盛會後的所思所感：

玉山於臺疆，尤為高峻，詩社之所以取名也。文人韻士之游寓者，與斯土人士，以時會，胥俱置酒吟詠，以敘雅懷，以尋情交。名聲遠聞於帝都，余久知有玉山吟社者也。今茲己亥，余來臺北，始列社盟。五月念五日，會於城外江瀕亭，台南縣知事磯貝蜃城、新報主筆木下大東、清客章枚叔等三十餘人，探韻賦詩，錦繡滿筵，……彼我相忘，新舊不問，人人既醉，不復知為天涯千里之客，而斯土人士亦忘其為新版圖之氓也。嗟夫！……異鄉殊域之人相合而其歡更洽，則其發於詞賦者，欲不佳得耶？以此謳歌聖世，黼黻太平，宣揚南瀛文化者，蓋不鮮歟。然則吟社之設，其豈徒爾！雖曰與玉山比秀拔可也。若夫徒飲食醉飽，而貪一旦之娛樂而已，……恐非所以設吟社之意也。⁹⁰

上述文字中，中村氏首先闡釋了玉山吟社命名的由來，以及做為臺灣此一殖民地的第一個日人漢詩社，玉山吟社在日本內地頗負盛名的事實；接著則陳述自己入社的原因背景，乃因1899年來臺就任國語學校教師之故，其後在該年五月參與了在臺北江瀕亭所舉辦的吟宴，因此得以近距離觀察「玉山吟社」真實活動樣貌，他深刻

⁸⁷ 參見鷹取竣克明〈大雅唱和集序〉，文見鷹取田一郎編《大雅唱和集》，臺灣日日新報社印，1921，頁1-2。

⁸⁸ 參見上山滿譯〈東閣唱和集序〉，文見豬口安喜編纂發行《東閣唱和集》，1927。

⁸⁹ 有關「玉山吟社」，楊永彬藉由費心蒐羅、彙整《臺灣新報》上的相關訊息，已對吟會雅集與課題情形，做了初步勾勒與整理，參見〈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文章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2000），頁118-130。

⁹⁰ 參見中村櫻溪〈玉山吟社會宴記〉，文見氏著《涉濤集》，自印本，頁3-4，1903。

體察到，詩社提供給遠從千里而來的日本遊子，在他鄉中一個相濡以沫、消解鄉愁的場域，而被殖民的臺灣人士也在其中藉詩唱和而忘卻割臺滄桑之苦，於是「異鄉殊域」者，與「彼我」、「新舊」之人，都有了相合共歡的時刻，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暫時拋棄離鄉之悲或喪國之痛，以詩會友，樂而忘憂。面對此情此景，中村氏以為詩社最終的歡愉氣氛，正是對日人治理之下的聖世太平、南瀛文化的最佳謳歌，「玉山吟社」真正提供了日、臺文人心靈慰安的詩歌空間。由上可知，日人在臺所成立的漢詩社，不只具有籠絡臺人之目的，其對來臺日人，同樣也發揮了降低日人懷鄉惆悵的安定作用。

理解了第一個日人漢詩社的運作情形與詩社意義後，那麼做為最末的「南雅詩社」又是何等情形呢？也是社員之一的魏清德，以為這是一個由真正的「詩人」所組成的文學社群，具有追求獨立意義文學之美的境界，故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論及了「詩人」的特殊人格特質與審美品味，並藉此明確指出南雅詩社獨樹一幟的殊異文學性格：

惟詩人異是，解體世紛，宅心物外，望蒼蒼之正色，履厚厚之坦途，朝烟夕月，春煦秋陰，寤寐詠歌，置酒絃琴，樂足以自適而非所以自適也，趣足以合羣而亦非所以合羣也，此南雅社之會，所以不過十餘人。不為怨天尤世之言，不為逐利爭名之舉，結習容或未除，形跡尚近真率，辭非變騷，志則在雅。⁹¹

做為社員，魏清德比外人更能體認南雅詩社的屬性與特色，而顯然在其心中，這是一個具有鮮明文學質性的詩社，社員們彼此志趣相投，由於聚合自然，非刻意為之，所以社員僅有十餘人。而平日吟詠，不怨天尤人、不爭名逐利，讓文學回到文學自身，故吟社的文學性更能獲得確立與落實；至於社員們雖有結習難除，但行徑不失真率，執筆、口誦之時，也無變騷激憤之語，反而能保有志存雅正的美學風格與審美趣味。以上耐人玩味的描繪刻畫，其實相當細膩勾勒出「南雅詩社」的獨特屬性，而詩社本身內部更存在著一種張力關係，似緊而弛，似弛而緊，成功維繫了整個詩社的存在與運作，這種力量來自於社員們對做為一名「詩人」的人生價值與審美情趣的某種共識凝聚而成，這既非詩社規約所強力規範，或社長介入領導所致；因此就魏清德而言，也許「南雅詩社」與眾不同處，就在於每一位社員都對「詩」抱持無目的性的真正喜愛，並對於詩人不為外物干擾、不追求名利的身份，有著深刻的認知與實踐認同，而能齊心追求詩歌境界之美，且人人樂在其中。

上述透過了魏清德的清晰剖白，則「南雅詩社」相較於日治初期的「玉山吟社」，顯然更為看重詩社自身的獨立「文學性」意義與價值，以及社員之間真正達成以文會友的自然、自在交流切磋狀態⁹²。只是，魏氏有關「南雅詩社」社群性格與精神的體驗印象，與時任社長的久保天隨仍有所差異，久保氏在《南雅集》卷二之前所做的序文有謂：

社無規約，同仁亦不多，每月一次相會，銀燭紅箋，高歌吟嘯，既極詩酒觴詠之歡，又兼朋友切磋之義。……但吾曹所期，在謳歌昭代治化，鼓吹天南

⁹¹ 參見魏清德《南雅集》卷一序文，文見《南雅集》，1932，頁1。

⁹² 但需加說明的是，早期玉山吟社是日本、臺灣兩地文人「新舊不問」地從事集體活動，但南雅詩社，僅有魏清德一人是臺籍人士社員，雖然根據《南雅集》可知也曾有過與臺灣其他文人一同聯吟的情況，但終究相形之下，還是日人自身活動型態為多，顯然在與臺灣社群互動上轉趨封閉、排他。

奎運。蚊蚋負山故不量力，得諸君奮勵，誓當副其初志，予雖駑鈍不辭執鞭先驅也。⁹³

他與魏氏同樣指出這個主由日人組成的詩社，並未設有規約，且社員人數並不多，每月才舉辦詩會一次，但往往能詩酒盡興，並且追求詩藝之切磋，足見詩社的內聚力極強；不過詩社之設，除了文學性與社交娛樂外，擔任社長的久保氏以為詩社創立意義，更要為「謳歌昭代治化，鼓吹天南奎運」的任務而努力，而如此熟悉的話語，就如同過去以來日人主導下的各種詩會活動或社群組織所流露的文學政治性格一般，做為末代日人在臺灣詩社的「南雅詩社」，久保天隨依然要扛起協助國家發聲、頌讚時代的神聖使命。而結果是，在翻閱「南雅詩社」集體創作成果所彙編而成的《南雅集》時，可以獲見詩會的進行往往揀擇大臺北地區某一名勝、旗亭、俱樂部、公會堂或私人宅邸來召開，因此詩人間的聚合互動得以與旅遊相結合，較具娛樂性與聯誼性；至於實際寫作狀況，不管是在吟會開始所最先出現的席上聯句，或是其後的問題賦作⁹⁴，就如魏清德所言，多數詩人在多數時刻，往往會以詠景、抒懷的型態書寫，以進行詩人間的技藝交流、內心情感的分享，但其中久保天隨較會在創作之際與當時國家處境、社會時勢相連結，堪稱莫忘吟詩報國的「初志」，且真正做到「執鞭先驅」的示範，而其餘詩人則有時亦有與久保氏相唱和的現象⁹⁵。是以，整體而言，「南雅吟社」便以如此複雜面目之文學／政治性格而成其特色。

陸、結 語

日治時代曾有為數不少的日本漢文人來到臺灣，由於居留目的、時間長短不同，各自與臺灣發生的關係也深淺不一，其中久保天隨是昭和時期來臺日本漢文人中最为重要者，因此本文特別針對此一個案進行研究，希望藉此掌握、理解日臺間因「漢詩」書寫而展開的彼此互動關係。

而在本文中，首先透過了相關報刊史料的收集、閱讀，以及若干久保天隨詩集的剖析，進而建構其人生平、心靈與詩歌創作趨向的大致梗概；其次則是進一步探索久保天隨對於「漢詩」書寫的執著心與使命感，並從中釐析其人如何藉由漢詩扶振日本斯文，以及逐步完成個人與東亞漢詩界跨界交流的壯舉，因此也使本文的研究向度，可以放置在日本漢詩與東亞交錯之問題框架中來思考。當然，做為一位日本漢詩人，由於個人主觀的日本本位意識或帝國意識的干擾，乃至客觀因素上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久保天隨的漢詩東亞行旅不易前進，而欲齊心扶持漢文的夢想也將遭遇阻力，陳衍在《澎湖游草》序文中的暗諷，正說明了當時的「東亞漢字圈」之間，實際存有不和諧性的衝突關係。

再者，從日本到臺灣，當久保天隨以教授詩人之尊來到臺灣時，臺灣因為南方熱帶圈的特殊景象，得以為其詩歌視野帶入「南疆風物色彩」，這對於久保天隨的詩歌創作生涯別具突破性的價值；只是，較矛盾的是，在新學與舊學之間，身兼學

⁹³ 參見久保天隨《南雅集》卷二序文，文見《南雅集》，1932，不計頁次。

⁹⁴ 這種寫作型態與日本內地「隨鳴吟社」近似，當是曾任「隨鳴吟社」主幹的久保天隨移植、模仿的結果。

⁹⁵ 關於相關詩例如《南雅集》第3卷第23集，頁1，久保天隨〈新春雜述〉：「豺虎跳梁殺氣雄，將軍一擊總成空。王師也在烏桓地，應拜扶桑出日紅」；或第35集，頁6，「席上聯句」，陵村：「熱河警急莫錯機」，古邨：「想見食漿迎旭旂」，成軒：「王道坦坦民所依」，天隨：「早晚寰宇揚國威」。

閱與漢詩人的角色，竟使得他在日本新學術潮流與臺灣傳統漢詩界中同時陷入兩難的困境。至於久保天隨在 1930 年於臺灣所創的「南雅詩社」的文學政治意義，做為日人在臺的最後一個漢詩社，實具有承繼與總結日本在臺漢詩表現的脈絡意義，故其結束與開始都頗具重要性，此部分亦應予以正視。

綜言之，從日本到東亞，久保天隨藉由旅行所帶動起的漢詩流動路徑，指向了同文關係下，日本與其他地區、國家之間的合作、角力、斡旋與協商，因此每一條路徑所顯現的，無寧即是漢詩問題在東亞的豐富糾葛面貌，而本文所從事的相關研究，正是其中的顯影之一。

Kubo Tenzui and the Han-wen Poetry Society in Taiwan

Huang, Mei-E

Abstract

Kubo Tenzui was the most important Japan sinologist of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e came to Taiwan as a professor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at 1929, two years later he established the Nan-Ya poetry society, and died for illness in Taiwan at 1934. Kubo wrote more than one hundred books, twenty thousand Han-wen classical poems. Writing Han-wen classical poems was his lifelong undertaking. He also loves travelling, not only at Japan, but also China, Korea, Manchukuo, Taiwan, Liuqiu etc. During his journey, the Han-wen classical poem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poets, and tried to revive sinology. Kubo was good at writing classical Han-wen poem, his work showed little features of Japan, but instead of this, the thought of Japan Empire actually pervades in his sentences, therefore became the practice of the imperialism discourse. Hence, when Kubo came to Taiwan, he viewed Taiwan as a tropic material, and a new place for him to get reputation. Unfortunately, not every Han-wen poet in Taiwan accepted western learning, and not every occidentalist in Japan welcomed sinology, so Kubo was trapped, he didn't please both sides. For me, not only the double faces of Kubo, but also his position of the Eastern Asia Han-wen writing, make him become a figure that worth for more research.

Keywords

Kubo Tenzui,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 Han-wen classical poem, the Japan Han-wen literature in Taiwan, the Nan-Ya poetry society

